

#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2007 年 8 月

##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阅读报告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阅读报告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阅读报告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阅读报告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阅读报告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阅读报告小组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

## 编者按：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7 月号问世之后，获得的鼓励超出编者的想象。在这里，向每一位读者表示感谢，尤其感谢那些提出具体建议或者提出更高期待的朋友。为了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就不一一引述读者诸君的称赞了。

诸位的关注，使得编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本期在“推荐”、“阅读报告”和“书评”之外，增加“话题”、“来论”、“互动”和“来信”四个栏目。“话题”主要围绕当下正在发生的问题进行探讨，“来论”从读者来稿中选摘值得注意的章节，“互动”对“中国独立阅读报告”豆瓣小组讨论的一些议题进行整理，“来信”是读者和编者的沟通。

我们对本期阅读报告的不满之处有两点：第一，涉及的中文原创著作太少；第二，涉及的可读而又耐读的著作太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观察员虽然各尽所能，依然视野有限。我们向读者推荐书籍，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互相照亮对方。

## 作者名单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

**观察员：**写作：戴新伟（广州）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书评人：**羽良（北京）、严飞（香港）、莫之许（北京）

## 推荐

陈染:《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作家出版社, 2007年5月, 18元。

体现了混淆在真实与虚妄之间的文学魅力。

[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 张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6月, 68元。

以往我们总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教科书奉为经典, 现在读一读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学者写出来的好书, 可能会收到切身体会的阅读效果。

[美]布鲁斯·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 冯克利译, 商务印书馆, 2007年6月, 33元。

哈耶克是所有经济学家里最幸福的人, 因为他在有生之年, 看到自己的学说变成了现实。

[孟]阿西夫·道拉:《穷人的诚信: 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 朱民译, 中信出版社, 2007年7月, 35元。

当1998年孟加拉遭遇特大洪水灾害时, 格莱珉银行也触发危机。由此, 尤努斯决心改造格莱珉模式, 使其更灵活、更贴近穷人的需求。历经四年的改造, 他们成功地建立了被称为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新业务模式。

[美]奥弗洛赫蒂:《尼采与古典传统》, 田立年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5月, 34.8元。

对于尼采的不同态度决定了我们在当代思潮情境下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立场。

[加]恩伯莱·寇普编:《信仰与政治哲学: 斯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 谢华育、张新樟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6月, 39.8元。

20世纪的两位伟大政治哲学家之间的思想交锋。

[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 郑晓岚、陈宝国译, 华夏出版社, 2007年6月, 29元。

约翰·穆勒让我们看到一个内心丰富的自由主义者。

[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 范丽珠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6月, 35元。

研究中国宗教的典范之作。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的历史(1937—194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 30元。

以叙事的方式呈现当年的彩色场景, 不同于那种常见的黑白木刻式的描述。

[法]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神话学》(平装), 周昌忠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4月, 153.8元。

人类学的“追忆似水年华”。

## 独立阅读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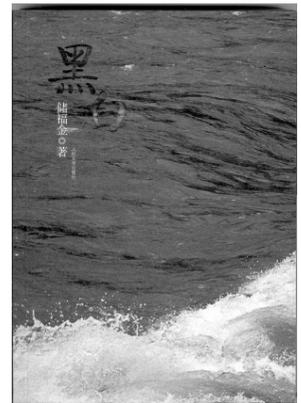
###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戴新伟 (广州, yukon1944@yahoo.com.cn)

#### 记忆中的小说

写作即记忆, 这种看法早已有之, 不过, 阅读与记忆的关系是否亲近则并不归结在记忆本身: 很多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作品, 后来看, “居然是那样的东西”。看到江苏作家范小青的新长篇《赤脚医生万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7月), 我的第一反应是“裤裆巷”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早年看的电视连续剧)。反应最大的要数储福金的新长篇《黑白》(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6月), 储福金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1995年前后在《峨眉》杂志上读《雪坛》的记忆, 在此之前, 我没有读到过那么阴柔自然的小说, 民国的人物故事都很平淡, 也因其平淡, 显出小说氛围的哀痛和神秘, 这种匹夫匹妇的卑微, 并不是某些阴柔派的矫揉造作可比。

那个时候不会也不懂得从技术性的层面来看待作家及其作品, 单靠个人感受力来理解小说承担的风险很大, 这种“读后感”与当时眼界不高所见不多有莫大关系, 但我对储福金小说语言的看法——那种堪称美好的阅读记忆——在读这部新长篇的时候几乎没有改变: 《黑白》的开头虽然不吸引我(包括结尾), 但成年的陶羊子就逐渐地丰满起来, 带动了整个故事的可读性。《黑白》是棋手陶羊子的故事, 很显然, 这个过于抢眼的主人翁身份多少会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可以对比前段时间的电影《吴清源》), 小说表现得并不明显, 可惜宣传上倒是有些过于强调这是一部棋手的小说了。关于可读性上, 会不会有这样的因素——作者要淡化主题先行带来的堆砌感, 所以加大了可读性上的经营? 或许有, 但, 我一边读这本小说一边想, 能让人读下去的小说, 已经很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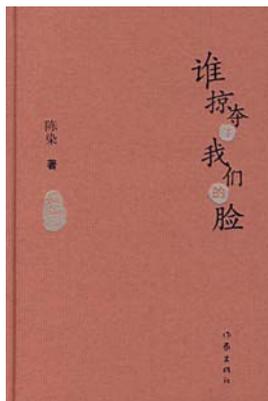
#### 记忆中的散文

对于文学而言, 回忆不仅是形式, 也可以是主题。就个人口味而言, 我比较爱看一些回忆气质浓厚的文学作品, 其真实与虚妄的不可捉摸, 我以为是文学作品最好玩、最有趣、最富魅力之处, 同时也能显示作家功力的深浅与气魄的大小——往往, 作家本人与出身地的相互影响关系决定了这个。只是阅读当代人写的此类作品, 必须忍受文体在散文与随笔之间的漂移——在汉语的语境下, 散文与随笔的区别濒临混淆, 所以在难以自觉自省的写作者那里, 这种漂移幅度之大, 大大影响了整部作品的气场和质量。

百花文艺出版社近年来力推青年作家的散文作品, 魄力堪赞, 不过恕我直言, 这些散文书太多了——作者多, 内容也多, 乍一看去都成了个人地方史, 尤其是某些旅游胜地的书, 快成旅游指南了——但事实上呢, 内容并没有多少让游客满意的地方。我之前读过的几本, 涉及云南新疆(恕不透露书名), 都是这种成色。至少, 不是我希望的那种书——我希望的是, 你能够告诉我, 这片土地对于生长于此的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这个世界与你向往的世界有什么不同? 它所给予你的幸福感与不满是什么? 老实说, 对于建筑的描绘, 对于风土人情的陈述, 读者我并不感兴趣(如果我对这些感兴趣, 就不会读这种缺乏准确性的介绍, 我会直接找旅游书。网上查更快)。

这样的写作, 类似于叶芝所批评过的, 不要把吃早餐的思绪当成诗! 描述出生地, 对于一位作家来讲, 其实妨碍了朝更阔大走去, 因为这只是一种半成品, 真正的价值所在, 是作家的磨练与吞吐, 将真实放在虚构里。成为文学, 而不是成为纪实。

最近读到的散文集《流水围庄》(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年5月版), 是福建作家黎晗写的, 围绕自己的生长之地围庄所写的散文, 大概是篇幅较少, 倒容易看到一些思辨色彩。但其中一些趣味性的东西, 又很让人把它跟比如车前子的《茶饭思》(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7年3月)那种散文归到一起。这个月我读到的最好的散文集应该是陈染的《谁掠夺了我们的脸》(作家出版社, 2007年5月), 看了有位朋友的书评, 我立刻想读, 因为他引用了作者的一句话: “我多么渴求生活里



温情深挚活生生的东西！”我读了这本书，按照“行规”，应该从陈染的作品或者从当代作家（散文家）来批评，但我觉得有这么一句就够了，现在的散文集里普遍缺乏这么一种自省精神，缺乏直接的、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作者称此书为“僻居笔记”，记的都是生活中的琐事，包括回忆——第一辑“我与我”后面几篇其实是自传了，也包括作者与家人与社会的关系——倒是可以从那种隐然的紧张里看出一种态度，作者对自己性格的公布，也指出了独自思考的必然。相对于生活中普遍的汲汲然，反映在文学中的消极、疑问这种不合作态度更值得赞赏。诚然，这部书简直有博客的模样，短章居多，但并没有流于记流水账，除了个别篇章过于私人化之外，第三辑“我与心”写得非常好，没有趣味，没有寄托，没有鸡汤，但作者个人的困境，却多少唤起读者的感同身受，尤其是这些描述又自然又深刻。

我以为，也正是这些篇章，决定了这部书的价值，它的确体现了混淆在真实与虚妄之间的文学魅力。散文和随笔两种文体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即使在西方语境下恐怕也是如此），在中外各种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类型的划分上，中国的散文是被拨得最踉跄的一个，但我赞同王安忆对散文的看法：

散文不是一种可以经常写，源源不断写的东西。因为散文是直接书写与我们生命有关的感情，生命有多么有限，感情也就有多么有限。（《王安忆读书笔记》，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

几乎可以说，这个看法有着明确的指引性。《谁掠夺了我们的脸》体现了散文的“直接书写”，体现了“感情的锐度”，体现了“难以描述的精神困境”，尽管，依附于当代散文身上的感时伤怀花鸟鱼虫之乐的风气还需要更多的人去剔除。关于散文和随笔的话题，如果用最近两套重版书来做一个简单的划分也挺有趣：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4月重版的“西风译丛”，像托马斯·布朗的《瓮葬》、博尔赫斯和索伦蒂诺的访谈《博尔赫斯七夕谈》，都是标准的随笔作品，而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重版的“诗与思文丛”，像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则是标准的散文作品，尤其是阿兰的《幸福散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这本书据说重版没有出，我在香港旧书店拣了一本旧版，读了只有一个感觉：散文是这样写的；内心不是口水那样发表的。

##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北京，susumartin@hotmail.com）

整个7月，我都陷在一宗官司的材料里。香港的庄胜公司去到上海盖楼，投资了好几个亿，也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合同，却不料政府中途变卦，联合法律、仲裁部门，一脚把庄胜踢出了局。说实话，这些年我见多了这样的官司，地方政府自有他们的不耻之处，但这些自以为财大气粗的开放商也没少暗箱操作，助纣为虐。《南方人物周刊》约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显然低估了工作的难度，成堆的卷宗，冗长的举报信，太多见不得人的细节，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感情天平究竟是偏向政府多一些，还是偏向开发商多一些。

好在这个时候伟大的道格拉斯·诺斯到了北京，我从这些黑黢黢的材料中抽身而出，去听诺斯讲课。几年不见，诺斯的银发似乎少了许多，身材好像也弯曲了，但他的思想依然闪耀着光芒。几年前，我读诺斯，甚至觉得他的话语比惠特曼的《草叶集》还要动听：

“政治与经济体系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体，它们都是现有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我们的双重平衡理论认为，要么经济与政治都趋向于开放的秩序，要么则都趋向于受限的秩序。如果经济与政治这两者有一方不变，另一方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转变。”

在另一个场合，我们还听到诺斯说：“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更多财富的保证，如果社会群体发现现有体制已经不能促进发展，那么就应该酝酿建立新体制，否则，经济就会处于停滞状态”。

如此陈述，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忠告，可是我们却似乎听不进去。看看我们的周围，无论是高居庙堂，还是身在江湖，人人都像这个7月的空气一样，灼热、浮躁、功利。当官的私底下忙着搭班子，老百姓忙着炒房炒股。你看看房价，豆芽菜似的往上涨，高过了那些节节攀升的摩天大楼，但是买房子的人却络绎不绝。有人在计算一个中等收入

的中国人，即使他 20 年不吃不喝，显然也卖不动北京 5 环以内的一套房子。股市也在涨，即使印花税率再涨一次，也拦不住股民的投资热情。这个热闹的夏天，人们除了炒房，炒股票，还能够做什么？

但是诺斯却在提醒我们，民众非理性的投资热情，在一个侧面反映出由政府力量拉动的经济体可能出了问题，表面高速增长 GDP，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安。我是很能体会诺斯的这些说法的，因为此时此刻，我也有一个具体的经济人的不安，同时我也清晰的看到了另一些经济人的不安。

事实上，诺斯的学问早在 19 年前就来到了中国，有人默默地把诺斯的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8 年）翻译成了中文，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无论如何，这是一件让人感动的事情，至少说明在 19 年前，中国已经有人在按照诺斯的范式，思考中国的制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说明 19 年后，我们距离诺斯的陈述还差距太远。



可是 19 年过去了，诺斯的书我们似乎还没有读懂，或者是读懂了但却不屑一顾，指望用诺斯的学说来改变我们，可能性不大了。我私下想，可能是诺斯来自美国，可能是诺斯开口闭口就说西方，而大家都认为西方的东西肯定不适合中国，至少我们绝对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走出一条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于是我就在新书里找，希望找到一些与我们的意识形态关键词类似的。谢天谢地，我还真的找到了这样一本书，它有着看上去非常体面、非常正确的书名：《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 6 月），作者是匈牙利人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68 元一本，虽然有点贵，但绝对是新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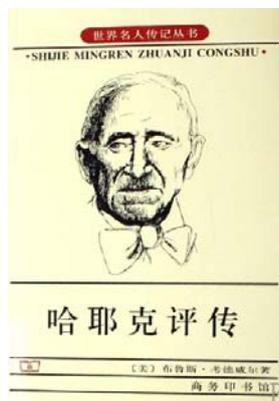
这就是我在火热的 7 月里要给朋友隆重推荐的第一本书。因为有着和我们相似的话语系统，因为作者来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读这本书，应该是耳熟能详。雅诺什·科尔奈本人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中文译本前面写下了他的中文感受：“本书在内容上涵盖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主要领域：政治架构、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对经济的监督管理、体制内部的信息流动、典型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塑造的典型行为特征。这一点构成了本书和许多其他著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它们一般都局限于分析某一领域的问题——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

好书的价值就在这里。以往我们总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教科书奉为经典，现在读一读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学者写出来的好书，可能会收到切身体会的阅读效果。那些站在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立场的右倾读书人，那些站在毛式社会主义立场的左倾读书人，应该能在这本书里找到我们需要的另一条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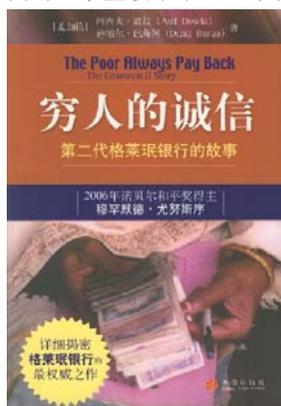
不过需要交待的是，这本书可能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应该是一本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合。第一章到第五章，都是在讲政治制度，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最后，才是比较正宗的经济学描述。这就像那些政经类媒体一样，总是把政治和经济搅和在一起，以显示我们宏大的思维。但从另一个角度，刚好也印证了伟大的诺斯制度经济学原理，同时也印证了眼下如火如荼的中国，人们在经历几十年的经济突进之后，那么多人此时正眼巴巴地等待着一场真正理性和建设性的政治体制改革。

各位，在雅诺什·科尔奈的社会主义陈述中沉迷太久之后，我还是回到了我热爱的哈耶克之中。向来古典情趣浓厚的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美国人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写作的《哈耶克评传》（Hayek's Challenge，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 6 月）。关于哈耶克，我已不能叙说太多。记得一次和梁小民教授聊天，他说哈耶克是所有经济学家里最幸福的人，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学说变成了现实。对于梁先生的感受，我是深有同感。不过国内少数人读哈耶克，要么望文生义，浅尝辄止，要么长篇大论，写一篇哈耶克读后感比哈耶克的原著还要佶屈聱牙。最近《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篇叶知秋的《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仅仅一个页面，我以为差不多把哈耶克的思想说清楚了，好文章不在长篇大论，此为好例子之一。

另一本经济学家传记，是《约翰·穆勒自传》（Autobiography by John Stuart Mill，郑晓岚、陈宝国译，华夏出版社，2007 年 6 月）。本书是穆勒的最后一本著作。他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童年时期的独特的学习方式和自己思想学说的形成过程，同时重点介绍了自己的写作和宣传活动，并对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如实地叙述了穆勒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和政治的历史，对于研究穆勒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书里收录了一些未曾出版的穆勒演讲稿。我仔细阅读了，其中“知识的用处”、“英国宪法”和“教会”对我有大影响。



阿西夫·道拉 (Asif Dowla) 《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The Poor Always Pay Back: The Grameen II Story, 朱民译, 中信出版社, 2007 年 7 月) 显然是我必须关注的书之一，因为我曾经在《南方都市报》写过尤努斯的书评，那篇稿子我自己现在读起来还是很喜欢。这本新书的出发点乃是从经典格莱珉模式的问题入手。当 1998 年孟加拉遭遇特大洪水灾害时，格莱珉银行也触发危机。由此，尤努斯决心改造格莱珉模式，使其更灵活、更贴近穷人的需求。历经四年的改造，他们成功地建立了被称为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新业务模式。本书就是描述这个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力挽狂澜、浴火重生的精彩历程，它独特的员工激励计划、业务管理模式和风险控制机制，相信能让国内的银行家们有所触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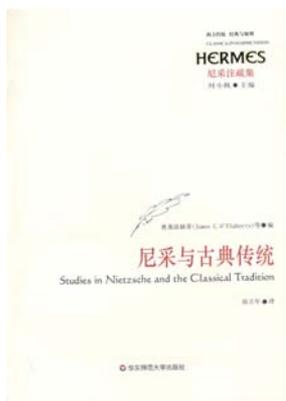
日本山口重克的《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张季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也是值得一读的好书。大凡我们读经济学，都是欧美学者居多，其实日本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大家辈出。二战之后，日本经济成为东亚地区的龙头，一直与欧美经济大国抗衡，其经济学理论应该也是相得益彰。本书追踪考察了市场经济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是如何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介绍了各个时代的思想家是如何观察和评价市场经济的；而且还探讨了现代市场经济对人类有哪些贡献，同时又带来哪些问题。这是一本专业教科书，可以认为是目前日本国内马克思经济学派有关市场经济的教科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本。

李稻葵先生的《2005 中国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6 月)，是我这个月关注的最后一本经济学著作。我听过李先生的授课，他是一个斯文有加，慎思有加的学者，面对问题，一般不妄断，总是有着长长的思考。他对中国当下经济态势的判断，也是独具眼光，毕竟在美国游学多年，稻葵先生绝对不是那种屁股决定脑袋之人。记得去年的某个时候，网络民众对稻葵先生一片谩骂之声，只有听了他的讲课，我才知道民众对先生的误解有多么荒谬。本书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邀请李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 2005 年的研究成果和专业学术论文中，精选的一个合集。它们以经验研究为基础，从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修正、更新或者补充主流经济学理论，与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者对话。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居民储蓄和投资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工资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居民财产分配和产权改制、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创新和企业家等方面的问题。

显然这是一本致用经济学著作，所以读了之后，对当前中国的一些经济问题会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些年经济学领域，只流传海外大家之作，国内经济学家的著作总是被海量信息遮蔽，我在一大堆图书里，找到稻葵先生的书，算是找到了本土经济学的自豪感。只是我听说稻葵先生虽然在清华大学谋生，但他的人身关系、组织档案似乎与清华大学还没有完全对接。中国的大学人际关系复杂，管理制度严格，不知道李先生的遭遇属实否。

##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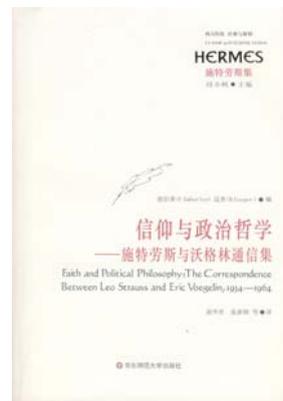


6 月，来自大陆、台湾及香港三地政治哲学领域的学者在浙江大学举行了一个以“公共哲学”为题的讨论会，以政治哲学的发展作为讨论对象。争论从专业角度来看，无非是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与古典哲学之间的分歧，但是会场上的激烈争论其实已经显示了，这些学者不同研究取向的背后，隐藏了他们对当代中国思潮的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差别从如今的出版状况当然可以窥得端倪，阅读本身就是思潮的一面镜子，从阅读的选择去观察时代思潮的变化，无疑是一条便捷的道路。

从古典政治哲学这一个脉络来看，最近陆续有值得关注的书上市。《尼采与古典传统》(Studies in Nietzsche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田立年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理应在好书行列中占得一席之地。这本书属于雄心勃勃的刘小枫所编的“尼采注疏集”系列，是一组关于尼采的解读文章，尽管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非常专业的解释，但是大家只要读一读开卷那篇《尼采

和古代世界研究》，就会强烈感受到尼采研究具有丰富的思想史意义，甚至可以说，对于尼采的不同态度决定了我们在当代思潮情境下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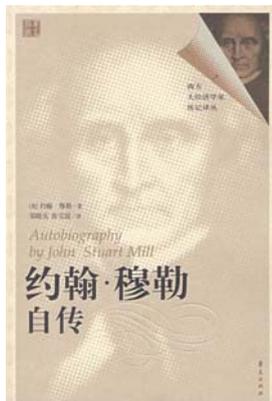
另外继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之后, 另一本关于沃格林的著作——《信仰与政治哲学: 斯特劳与沃格林通信集》(Faith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eo Strauss and Eric Voegelin, 1934-1964, 谢华育、张新樟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6月)也终于出版, 这与先前出版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 斯特劳通信集》(朱雁冰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06年8月)一起凸显了斯特劳所关心的哲学主题。沃格林虽然同样与斯特劳一样, 反对以英美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哲学体系, 但他与斯特劳同样存在分歧。沃格林唯一从美国带到慕尼黑黑大学的学生桑多茨(Ellis Sandoz)认为, 斯特劳坚持的是古典理性主义传统, 而沃格林则始终以超越问题作为哲学的唯一问题, 强调神圣体验的不同符号表征。这使得我们在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内部, 也看出两条不同的路径: 我们到底是因为认识而信仰, 而是因为体验到信仰才可能认识?



英美分析哲学一直不乏重要的著作, 但是最近却有一本颇为耐人寻味的分析哲学著作翻译出版, 那就是伯纳德·威廉斯的《道德运气》(Moral Luck,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6月)。伯纳德·威廉斯其实算得上是分析哲学门派里的一个异类, 尽管他并不那么大名鼎鼎, 但是分析哲学的圈内人无不佩服他的天赋才情。作为男人, 他风流倜傥, 不乏女性的青睐, 颇为八卦的是, 他当年居然还挖了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的墙角。

伯纳德·威廉斯并不相信分析哲学的推导演绎就能知晓道德的意义, 道德不能建立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 而是要看我们在实践中是如何理解我们自己的道德动机的, 因为人类的伦理生活太过复杂, 根本无法有一套道德教条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有趣的是, 伯纳德·威廉斯与以赛亚·伯林是十分亲密的好友, 据说前者对人类处境复杂性的认知, 也相当程度的受到后者的影响, 当年伯林在飞机上突然悟出分析哲学的局限所在, 从此杀出分析哲学的阵营, 专攻思想史, 而伯纳德·威廉斯明显并没有走的那么远。

如果说古典哲学与分析哲学这两个思想脉络只是在“古今”的架构下来思考政治的意义, 比如象帕萨·查特杰这样的后殖民主义学者, 则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思考如何反抗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最近出版的《被治理者的政治: 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田立年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 就是后殖民主义学者在政治问题的集中表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阅读在美国学界中打拼的印度学者们的著作是一个有趣的经验, 这并不是说阅读他们总会得到很多建设性的知识。印度学者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历史经验与认同危机所导致的,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学院文化左派在美国学院生产机制中能够理所当然的获得正当性, 这一个研究取向也被很多身在美国或在大陆、港台的华人学者所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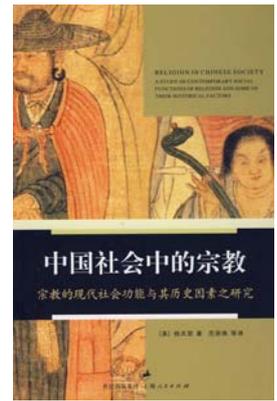


伯纳德·威廉斯因为分析哲学与自己的内心之间无法弥合, 开始反思分析哲学的局限, 而约翰·穆勒当年也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功利主义不符, 而产生强烈的精神危机, 从而开始对功利主义学说进行深刻的怀疑。最近出版的《约翰·穆勒自传》(Autobiography by John Stuart Mill, 郑晓岚、陈宝国译, 华夏出版社, 2007年6月)则给我们提供了一段极具参考价值的思想家的思路历程。本书并不是首次翻译出版, 以前曾有吴衡康、吴良健的译本《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 1987年), 或许有心人可以比较下两个译本的差别。

另外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康乐、简惠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也有了新译本, 台湾远流版这一系列历时几年, 已经在大陆出齐12本。最近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起推出的, 还有《古犹太教》(康乐、简惠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

这套权威的韦伯作品翻译虽然推出多年, 但是如何借助韦伯的思想来理解中国, 却没有看到更多的成果。余英时这次专门为大陆版写了序言, 当年他借助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出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 试图理解中国近世的社会思想变化, 但是今天随着思想资源的增加, 韦伯的位置似乎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这也是韦伯思想接受史的一个有趣现象了。

最后或许应该推荐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范丽珠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6月), 本书的作者杨庆堃出身于燕京大学, 后来长期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与此相比, 缺乏本土有力的研究者不仅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困境, 也是中国读者的无奈。这本书早在1961年就已经出版, 今天看来, 里面的很多研究细节显得比较宽泛, 但却把中国民间社会与宗教的一些重要问题勾勒的相当清楚, 读这样的书, 如同读一本中国民间宗教的通俗读物, 文字浅显却又意味深长, 这或许也是那一代学者们共有的特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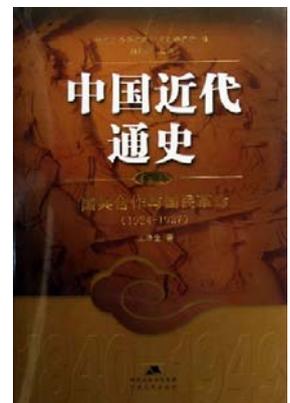
##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xy1978@hotmail.com)

7月18日,《中国近代通史》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出席会议并讲话。岁初,邬书林名闻天下,用不着多作介绍。主编张海鹏先生也非等闲之辈,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在专业领域一向享有盛名,但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在2006年。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对历史教科书进行批评,“冰点周刊”暂停出版。3月1日,“冰点周刊”恢复出版并且刊登张海鹏先生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两篇文章均传诵一时。一些同志对邬书林和张海鹏两位先生有意见,因此对《中国近代通史》也不屑一顾。对于这种“因人废书”的思维,我不敢苟同。限于个人兴趣和判断,我没有精力通读全书,而是挑选了第七卷和第八卷阅读。

第七卷是王奇生先生的《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八卷是杨奎松先生的《内战与危机(192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是我每次见到对近代史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推荐的书。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党,“如果没有强劲竞争对手,也许还能勉强维持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故其胜负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次购买《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最为担心的是两书重复太多,翻开一看,第一句就是相同的,整段整段的重复也有一些。还好,由于前一本是用377页的篇幅研究26年,后一本是用550页的篇幅研究4年,所以还是值得购买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一本比前一本详细,从框架和行文来看却不够精细,略有粗糙之感。杨奎松也用不着多作介绍,6月份阅读



报告曾经推荐他的《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大概限于通史体例,《内战与危机(1927—1937)》读起来不像《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那样跌宕起伏。此次媒体以《中国近代通史》(学术版)相称,不知是否还有非学术版问世,学者常常轻视公共化的表述,可是有时公共化比学术化还要难上十分。

斯诺和史迪威,这两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影响了抗战前后的历史叙述。延安特区的主流叙述是“斯诺模式”,按照方德万(Hans J. van de Ven)的说法,国民政府的主流叙述是“史迪威模式”(全称“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史迪威,曾被周恩来称作“最优秀的战士”,他对国民政府的批判众所周知,诸如腐败、无能、独裁。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胡允桓译,三联书店,2007年7月)里,方德万从“重看史迪威”出发,指出这种模式“模糊了国民党反对日本侵略和动员自己的社会面对入侵者这一事实”。朱鸿召先生对延安生活的研究,我曾在数年之前的《上海文学》上陆续拜读,他的《延

《安日常生活的历史 (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7 月)分为饮食篇、人文篇、男女篇、风物篇,以叙事的方式呈现当年的彩色场景,大小灶、“二流子”、秧歌、交际舞、狼与虱子,不同于那种常见的黑白木刻式的描述。尽管作者也参考了“三 S”(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史沫特莱)的著作,他的研究已经与“斯诺模式”有着不小的区别。当然,朱鸿召无意于用一个模式取代另一个模式,正如彩色电视无法代替黑白木刻。

14 卷列维·施特劳斯文集(其实是 13 卷,因为最后一卷是传记)出版之后,似乎很是寂寞,媒体鲜有推介,远远不如列奥·施特劳斯那么热闹,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但对这位 1908 年出生即将迎来百岁华诞的老人来说,寂寞和热闹已经没有区别。这套文集中,我最为期待的是 4 卷《神话学》(周昌忠译)。因为书架和书价双重因素,精装本出版之后我一直按兵不动。书架寸土寸金,精装本太占地方,再加上两种版本相差 60 元零 2 角,还是等到平装本上市,才买下《神话学:生食和熟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 月)、《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 月)、《神话学:餐桌礼仪的起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月)、《神话学:裸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月)。无论从篇幅还是文体来看,《神话学》都可以称作人类学的“追忆似水年华”。比如《神话学:裸人》的章节标题是:“家庭的奥秘”、“回音游戏”、“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辛酸的知识”、“追溯根源”、“神话之初”,单看这些,说是普鲁斯特的佚文我也相信。



科塞 (Lewis A. Coser) 的《社会思想名家》(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Idea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7 月),曾翻译成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译者都是署名石人。很多读者会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一点也不奇怪,石人者,十人也,这本书由十个译者合译。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译者署名何一,这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它是“合译”的谐音。这些化名都还可以理解,最不可思议的是多达 26 部的“诺贝尔文学奖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年),居然译者署名都是李斯等,李斯是谁,“等”又是谁,让我很是好奇,但不管是谁,我对这种书都没有什么兴趣。十个人翻译一本书尚能接受,一个人带着“等”翻译 26 部书,让人畏而远之。《社会思想名家》和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0 年)形成互补,阿隆主要涉及到前马克思·韦伯时代的社会学家,科塞则对与马克思·韦伯同时代和后马克思·韦伯时代的社会学家多有着墨,如曼海姆等。

“假包子”变成“假新闻”,使得言论问题再度成为漩涡。邱小平先生的《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对于言论问题有着精细的研究,但是过于精细,以致于非专业读者很难有耐心仔细阅读。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 (Floyd Abrams) 的《第一修正案辩护记》(Trial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王婧、王东亮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 5 月),把个人经验和重大案例编织在一起,很有些亲历历史的感觉。只是阅读这种书接近于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我更期待中国能够早日出台新闻法。顺便说一句,《第一修正案辩护记》虽然只有 300 多页,厚度像是 600 页,用纸不是一般的讲究。

正值盛夏,文章写到一大半,保险丝突然罢工,万籁俱寂,我不得不争分夺秒,与手提电脑的电池赛跑。西川曾经说过:“突然停电,使我确信/我生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停电》)蒋蓝,这位“发展中国家的抒情诗人”写过《有关死刑的身体史》、《有关警报的发生史》、《异端的宿命史》等随笔,每一篇都值得反复阅读。此次他的《思想存档》(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 年 6 月)将随笔结集出版,可惜这个存档是残缺的,其中一些最有价值的篇章未能收入其中——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抒情诗人”在抒情之外,必须考虑的发展中问题。

(补注:蒋蓝系观察员友人,特此说明。)

## 书评

### 香港故事的跨世代光谱

书评人 严飞 (香港, fei.yan@green.oxon.org)

回归十年大幕下的香港，跨世代光谱的书写正当其时。

香港文化界旗手陈冠中在经典论述《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描画了战后婴儿潮香港精英一代的成长经历。战后婴儿潮的这代人，普遍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八十年代见证香港经济起飞。作为香港土生土长的第一代香港人，他们的人生经验在香港形塑，代表着九七回归前的“香港成功范式”，是香港繁华时代的受益者。

书中如此剖白：“1970年代中，我们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从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资得最优化的回报。……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在这样的心态指导之下，以陈冠中为代表的这一代香港人，平稳见证了香港以股市楼市为支柱的经济起飞黄金时期，很多人一夜之间就发了财，在无意中就晋升成了社会成功人士，顺便造就了香港几十年的富贵与浮华、一代人的灿烂与飞扬，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

虽然陈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婴儿潮一代”的成功所在，也是香港今日的问题所在：自以为见多识广的这一代香港人实际上只是夜郎自大、过度陶醉，却不知道发财与腾飞只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但陈冠中在代际的纷争中，却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到了今天，那些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所谓“香港故事”，依然是由战后婴儿潮这一代人牢牢掌握和支配？



一本由三位三十多岁的香港新生代作家写就的《香港的郁闷》，通过刻画“下一代香港人”的郁结，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跨世代看法。婴儿潮的下一代，普遍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经历九七年后经济泡沫爆破带来的失业创伤，现届三十岁上下，也被习惯的称之为三十世代。

这些香港三十世代，相信会是最有香港文化的一群。他们懂事时已陪父母听许冠杰，看郑少秋，孩童时代收看本地制作的儿童节目，成长期遇着香港文化的黄金岁月，港产电影、电视及流行歌曲常伴左右。最重要的是殖民地色彩转淡，与中国内地的交流融合还未完全建立，通讯科技也尚未发达，对香港本土的记忆也因此更加深刻和地道。

但和一跃跻身成为社会中上层的“婴儿潮一代”比起来，香港的三十世代却又是困惑的一代。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所谓的“麦理浩时代”之前的英国殖民时代，青年时期便要面对实实在在的香港前途中英谈判，读大学或踏足社会前后又碰上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大学毕业刚刚进入职场，已经开始讨论“谁偷了你的工作？”。特别是到了九七之后，金融风暴一夜间吹走了所有的经济奇迹和神话，香港社会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变幻莫测，民众难以理解、难以适应的大背景之中。下一代的香港人不得不开始整天检讨香港的出路，要和上海做比较，要和新加坡争高下，日日在边缘化的危机意识下，担忧自己会不会成为又一个被“边缘”的对象。职场生涯和世界观的转变令香港三十世代不得不重新反省工作价值，一切战后“婴儿潮一代”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迅速地在三十世代眼前消失，在对比之下的郁闷中被迫抛弃理想主义，返璞归真。

对此，隶属“婴儿潮一代”的香港社会学家吕大乐在其新近出版的新书《四代香港人》中，全面审视了香港社会中这种跨代的矛盾，并将“香港人”的讨论范围，往回扩展到战后来港打拼的一代，亦即二十及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书中，吕大乐把香港人分成四代：第一代是经历二次大战和国共内战之后，才辗转来到香港的内地移民一代；第二代就是陈冠中笔下的战后“婴儿潮一代”；第三代则是以《香港的郁闷》为代表的香港三十世代；至于第四代，则是那些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批香港青年人。

在吕大乐看来，香港跨代的矛盾，实质上是现今香港四代人精神结构上的如实映照：生于战前“第一代”，虽然因着难民心态而大多无法视香港为家，但他们比起往后任何一代都更加坚忍、刻苦和勤俭；婴儿潮的“第二代”虽然撰写了近二三十年的“香港故事”，但却忘记了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接班空间，甚至更要以百业翘楚的姿态对下一代指指点点；成长于七

八十年代的“第三代”，正直人生壮年，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却受制于奇特的跨代结构，始终无法在香港历史中顺利登场；至于出生于八十年代的“第四代”，更是因为缺乏选择的机会，而被质疑为是否有能力担当起的香港未来。

如此，香港今日社会的世代困境已被勾勒出一幅较为清晰的图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须注意到，陈冠中、吕大乐他们的世代观，依然是以自己乃至父辈的经验为叙述主体，因此在对第四代香港人精神状态的摹写上，难免缺乏感同身受般的体悟。八十年代出生的香港第四代，他们都是殖民地香港的最后一代。那 198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八字头”，就是最后一批能记得殖民时代生活的香港人，只是这样的记忆，已经模糊和遥远，绝大多数的“八字头”，他们还没懂事，《中英联合声明》就已经签订，不用在追昔往日光辉岁月中担忧未来；“九七回归”也不再是“大限”，而成为他们众多节假日中的又一个，维港两岸璀璨的庆贺回归烟火成为他们的欢乐回忆。

“八字头”也是最后一批接受殖民地教育，被教化为认同香港多于认同中国的香港人。在各种“香港梦”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好些“八字头”便眷恋殖民地时代，而在此以后更年轻一代的香港“九字头”，则在“心系家国，爱我中华”的公民教育下成长，对中国的认同更加浓厚和强烈。但矛盾的是，现实的“八字头”也时刻被教育着要进军内地，经济机会就在神州大地。他们不得不思考中国、认识中国，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学习普通话，努力参加各种内地学习团，“中国概念”成为他们最实际、最经济的长远发展考量。

尽管在吕大乐的笔下，香港的第四代“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输家”，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失去自我反思、拥抱理想的能力。例如在这两年香港建构集体记忆的大潮前，“八字头”所拥有的香港情怀虽然只是知识，而非回忆，但是保卫天星码头，保卫香港风格的运动中，却屡次出现他们抗争的身影。本土文化固然不是香港的唯一特色，但“八字头”的香港人都相信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多元包容的香港核心价值，他们中一些冲在最前面的年轻人，更是热烈而自觉地去主动认识、整理、保育旧时代的香港文化，想要将香港特质，在自己身上传承。

当然，香港的跨世代论述并没有就此终结。再过十年，现时的二十世代、三十世代，会渐渐演变成带领香港前进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勇气和承担，他们的责任和使命，都将决定香港的未来，到底是更加美好，还是忽而沉沦。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曾经在他著名的巴黎拱廊研究计划中，引用过法国历史学家米希列 (Jules Michelet) 那句著名的格言“每一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 (every epoch dreams the one to follow) 作为背景音。所以，不妨也让我们拭目以待，给未来的“香港故事”投去更多支持和鼓舞的目光。

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增订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 年 6 月；

韩江雪、邹崇铭：《香港的郁闷：新生代 VS 婴儿潮世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 年 5 月；

吕大乐：《四代香港人》，香港：进一步多媒体，2007 年 7 月。

## 话题

### 甘阳的观念游戏

书评人 莫之许 (北京, mozhixu@hotmail.com)

甘阳先生在《读书》杂志 (2007 年第 6 期) 上发了一篇《中国道路:30 年与 60 年》，引来不少非议，好奇之下，我也找来读了一番，在这篇文章中，甘阳先生对共和国的前 30 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遭致了右派的不满，而他所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偏离现有的正统意识形态，而肯定又为官方所不喜，然则，甘阳先生何以要作此不讨好之事呢？

以我对甘阳先生诸多文章的理解，民主始终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不仅仅是“市场”、“社会主义”和“儒家”，于是，当我将这篇文章与甘阳先生的早年文章《公民个体为本 统一宪政立国》合并起来阅读之后，有了一些看法。

在《公民个体为本 统一宪政立国》(《二十一世纪》1996 年 6 月号) 一文的结语中，甘阳先生明确提出：

中国政治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历来那种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来回摆荡的历史循环，



就必须走向“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的宪政民主政治，其核心是将中央权力直接奠定在全体公民的授权，其形式由此必然体现为中央权力的全国直选；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所带来的“中央与地方”的张力加剧暴露了目前中国的中央权力事实上并无自己的基础，但同时也为以“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的宪政民主方式来重新奠定中国的中央权力带来了一定的可能，即走向全国人大的直选，但其前提条件为执政党必须转化为“选举政党”和“议会政党”，在中国今日条件下，这意味着从“务实主义盟主党体制”走向“绝对优势党体制”这一转型。

如果甘阳先生没有收回这一看法，那么，我理解中的甘阳先生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在意识形态上，现今的执政党抛弃其正统意识形态，而以传统文化的现代承担者——儒家社会主义——为其意识形态；

2、在政治体制上，建立起一套大国民主体制，现今的执政党以自由公开的选举而获得绝对优势，继续掌握政权；

3、在经济体制与社会政策上，既坚持自由市场的体制，又以儒家社会主义的平等政策（二次分配）调和其间；

我认为，或许这样的理解，才是甘阳先生的原意；而真是这样的话，甘阳先生《中国道路：30年与60年》一文，其实不过是一种尝试，即通过将30年与60年一起评价，从而为执政党的转型尤其是意识形态转型提供参考。

正如在《公民个体为本 统一宪政立国》一文中甘阳先生曾经指出的，“今日之事由此也并不是单纯反对大一统的传统而走‘封建’的老路，而毋宁是要继承儒家历来重视长治久安之道的传统，探讨如何在中国这一巨型大国以民主的方式重新奠定中央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甘阳先生看来，中国的民主之路没必要也不应该以重建政体的激进方式进行，而应以政体重建的渐进方式为优先选择，这既意味着政权的连续性应予尊重，也意味着政权（执政党）的连续变化，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窥见甘阳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三种传统”的意旨所在了，因为，能够承载“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和“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于一身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当今的执政党——当然，这还需要执政党确实转变其意识形态并容纳儒家的内容。

进而，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提出，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的，而有着政治操作的意味。甘阳先生在《中国道路：30年与60年》中说：“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这样学理化的表达或许是为了降低政治敏感性，但我可以尝试着将其翻译一下：

所谓的28年传统，其实指的是28年来形成的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利益群体，尤其是资产和知识群体；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传统，表面上是回头看，实则指向的是未来，即绝对优势的党所不可或缺的选票，也就是广大的劳动群体；而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反倒是可有可无的，不过是一种包装之术罢了。于是在我的理解，所谓的“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就不过是甘阳先生多年前提倡的“绝对优势党体制”的升级版罢了，即一个既包容资本利益但同时又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争取到绝对多数选民支持的体制，一个形式上自由开放但实质上权力集中的体制，一个以传统保守为意识形态但又兼容开放的体制。提倡儒家社会主义，其根本要害尚在于通过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来获得选票而已。我想，甘阳先生不大可能会收回自己通过民主宪政建立合法性基础的旧说，那么，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提出，其实是在这一旧说的基础上，更贴近地思考执政党的转型，而其根本，则在于建立起一个自上而下的新执政联盟而已。

28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在社会的中上层产生了一个游离于传统体制之外的利益群体（资产与知识群体），又松弛了传统体制与劳动群体之间的联系，那么一个大国政权，如何将这两种离心的群体重新整合进来并以此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甘阳先生提的药方，尽管有点吞吞吐吐，但倒不如有些朋友想来的那么浅薄无聊。

不过，药方可以是观念的游戏，实际却未必如此。当然，甘阳先生可能不这么认为，据他自己的看法：“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的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老实说，我实在没有觉得有这么一个所谓“新改革共识”的存在，而只能把它理解为甘阳先生的愿望。进而，我只能认为，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过是甘阳先生在自身愿望基础上的一种观念游戏。而且，甘阳先生的观念游戏走得太远了，也太早了。在权力阴影下意淫权力的观念游戏说好听一点是幻想，说难听一点就是自慰。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只能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开出药方，权力照方抓药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甘阳先生还是太80年代了。

## 来论

### 清湛圆融的“礼乐风景”（节选）

——读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

路迪（广西北海人民广播电台 编辑、主持）

初见《千江有水千江月》（以下简称《千江》）这本书，是在读高三当口的，时间如流水，滔滔奔涌不舍昼夜，我在隐隐的自责和焦虑中把这本书看了又看，文中章节几可出口成诵，却欲罢不能。

小说从台南布袋镇一个海港的蔡姓家族的故事写起，和热播于屏幕上的乔家大院，范家大院这些大宅门中人心险恶的明争暗斗不同，蔡氏家族依然保留着淳朴善良，亲厚友爱，通情达理的心性。长慈幼孝的家人围坐一处，焖油饭，包汤圆（分冬至汤圆和七夕汤圆），裹粽子，晒端午节的午时水洗脸，新娘子做香袋分给顽童……

《千江》自1981年出版以来，已成了台湾本土作家创作的最畅销不衰的小说之一，几乎是一代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千江》所遭遇到最严苛的批评也是来自另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台湾女作家龙应台。龙曾撰文对《千江》中的保守进行犀利地批判，认为其愚昧、落后、可笑。对扛着女性主义大旗出道的龙应台来说，在细节中表现出来的守节情不移、男尊女卑等观念的确与理直气壮的她水火不相容。但萧在文中所刻画的“礼乐风景”本身是一个和谐圆融的整体，好像一轮明月，有如练月华，也有朦胧暗影，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能从厨房、水井、菜园、歌仔戏中体悟生命重量的贞观会披坚执锐地向大男人沙文主义宣战——她的沉静与淡定中蕴藏另一种力量，“礼”的端庄隽永点点滴滴浸润其间。而且，以此时映当年，那些看起来因为“陈旧与落后”已被现代社会摒弃的持重温情，反而是值得留恋珍惜的所在。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人类原有的许多高贵品质，似乎在一路的追追赶赶里遗失；追赶的什么，却又说不上来，或者只有走得老路再去拣拾回来，人类才能在万千生物中，又恢复为真正的尊者。”

比较有意思的是龙在近些年的演讲中说：“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头有自己的礼乐文化，人跟自然、人跟自己、人跟社会的意义在内。只不过因为不断的大浪一次又一次地打来，一次又一次的退掉。也因此认定我们的传统就是落伍的。”小说《千江》平和而坚韧地与被高速现代化的工业破坏掉的古典、传统抗争，这恰恰与龙应台“全球化之后的我在哪里”的质疑殊途同归。

## 互动

### 大学图书馆应不应该对社会开放？

桑克

据调查，我国大学图书馆普遍存在文献资源利用率偏低的现象。我国大学图书馆的文献利用率不足30%，相当一部分资源被搁置。到2004年为止，我国大学图书馆藏书流通率平均低于40%，个别的还不足20%，也就是说有4亿册馆藏图书在睡觉，相当于全国公共图书馆的藏书总量。这造成了极大的馆藏资源、设备及人员的浪费。

想向各位学者和朋友提5个问题，请帮着回答一下。如果您能提出其他问题，更是感激不尽了。

1.虽然教育部2002年2月21日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第二十一条明确指出：“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但是我国大学图书馆大多不开放，这是为什么？您是否认为应该开放，理由是什么？

2.我国大学图书馆藏书流通率平均低于40%，个别的还不足20%，也就是说有4亿册馆藏图书在睡觉，相当于全国公共图书馆的藏书总量。如果算上寒假暑假的闲置，造成的馆藏资源、设备及人员的浪费是惊人的。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国外大学图书馆早就向社会开放，而我们的大学图书馆开放却遇到阻力，您认为最主要的阻力是什么？

4. 您认为现阶段开放大学图书馆应从哪里入手?
5. 国外大学的图书馆是怎么面对社会读者的?

**女范进:**

总体而言还是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决定的。

**veron:**

初看起来, 大学图书馆问题是个服务意识与管理问题, 实际上是大学的制度属性问题。如今的中国大学虽然是教育事业单位, 但是实际上由于党管教育的主导方针没有彻底改变, 大学仍然是行政机关的一个衍生分支, 因此这里根本不承担任何公共服务的职责, 要让这样的大学承担起社会的公共服务职责, 基本上不可能, 不要说对社会开放, 连学生的借阅都无法得到保证, 更不用说是社会性的公共服务。另外在具体管理上, 盲目追求高流通率, 导致借阅周期非常短, 因为这既可以使得一本书的流通指标看起来很高, 同时库存也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数量, 正是这些对于图书借阅的荒谬认识, 所以你就会看到, 大学图书馆居然以 2 个月作为借阅周期, 而且不管有无人需要该书, 都必须按期归还, 这和国外大学图书馆借阅数量基本无限制完全无法比拟。

除开行政官僚机关的一般习气, 今天大学一方面被推向市场化, 一方面在控制上却越来越行政化, 这反映在一方面教育产业化, 一方面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日益加深, 比如在资源上游给予卡扣, 什么 211, 985, 都是政府利用资源控制大学的重要砝码, 另一方面大学领导也在这样的环境下日益行政官僚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学无法向一个公共教育服务的机构转化, 而日益成为官僚机构的一个附属部门而已。

**sorrylee:**

提出这种问题, 想必是对这几年高校图书馆使用状况并不了解。

复旦和北大的图书馆都用了几年, 我的体会是——复旦图书馆总是座位紧张, 通常要在早上 8 点开门前排队才能有位子, 阅览室紧张成这个样子, 怎么可以对外开放?

北大虽然不存在阅览室没位子的情况, 但想借的书往往被人捷足先登。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总量虽多, 但一种书只有三个副本, 热门书根本不够本校人员使用, 若对外开放, 会严重影响本校人员的研究工作。

高校图书馆应该是专业研究机构的配套设施, 它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研究机构的需求。

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 1、因为大学扩招后在校学生太多, 图书馆资源有限; 不应该开放, 理由同上。
- 2、图书馆的图书出现闲置, 不是因为读者太少, 而是因为这些图书本身就冷僻。
- 3、我国高校图书馆空间太小, 学生太多, 无力接纳校外读者。
- 4、扩建图书馆。
- 5、不清楚。不过北大图书馆也会接待校外人员, 如果确实出于研究需要的话, 不过要出示单位介绍信。

**还有我, 是一头狮子:**

其实不仅是图书馆问题。国家政策常常难以体现在日常事务上, 正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难题之一。政策的下达与实施, 往往因为可靠性与效率协调不一致而无法进行。而且, 从理论上说, 政府有权规定或者限制某一项政策的开展, 但在实际的过程中, 既得利益都常常不去执行甚或阻碍它的实行。

对外开放图书馆, 学校当然地觉得, 所造成的麻烦将远超它们所得到的价值。故谓开放校图书馆, 阻力首先就是学校。(特别是在国外) 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后才是没有围墙的学校图书馆。但在一个还没有足够公共意识的大环境里, 学校甚至学生, 都是有学校资源对外开放的捍卫者。学校考虑的问题显然主要是从本身出发, 即先考虑学校利益, 然后再扩大到学生和雇员。只是在这以后, 才会关注到学校以外的需要。这无疑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显然非一墙之隔, 也许比图书馆内成千上万种藏书加起来的距离还要长。

**李后主:**

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复杂。不能国外有什么,中国就简单的照搬。中国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源分配不均,人均机会太少。大家都是怀着功利的目的去读书。诚如楼上所言“在一个还没有足够公共意识的大环境里”,共享是不可能的。

所以,楼主的问题其实是很难回答的。

**leleye:**

我也常常想这个问题,以法国(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两个城市,权且算是提供另一个视角.

我觉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相对专业化程度高,而且大部分书没有副本,不太适宜向公众开放。部分图书馆安检系统不先进,图书流失很严重。(请注意我没有具体的数据,仅凭经验,待查)

相比斯特拉斯堡,学校图书馆也同样是限制的,但是市政图书馆系统非常发达。仅市区就有超过 12 个不同大小的图书馆,而且各图书馆之间网络相连,馆际互借也比较方便。最好的是这些市政图书馆,藏书丰富多样,报刊杂志通俗小说流行音乐 etc.

巴黎同样也区分专业性图书馆和一般大众图书馆,比如蓬皮杜图书馆就是面向大众的,而国家图书馆就偏重于研究性质。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是或许发展市政图书馆体系是更好地选择,并且可以在市政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多功能的文化中心,最好的例子当然是蓬皮杜图书馆。开放大学图书馆一方面可能给大学管理带来巨大负担,而且就资源性质等方面来看也不实用。(当然,我想各地大学图书馆或许差别较大,也不能一概而论之)。

嗯那,个人观点,权作参考。

**860124:**

sorrylee 言之有理。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图书馆间的资源就不能共享,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各学校图书资源比较匮乏的问题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至于自习室暂时确实不宜对外开放,再说校外同学需要自习可以去教学楼。自习室座位确实比较紧张,再说我们学生好歹也是交了学费的。

**huckxu:**

暂时先不说大学图书馆吧,虽然毕业 1 年多了,现在借书比借钱还难,基本就只买不借了,很怀念在学校图书馆的 4 年时光。上个月去深圳中心书城,顺便也去逛了下百余米外的对面的深圳市图书馆,本以为自己不是深圳本地居民,又没有借阅证,是进不了门的;哪知到了门口一看,整个图书馆 7 层楼(?)有 3 或 4 层是开放的,像一楼的期刊报纸就可以随便翻阅。我逐级而上直到 5 楼,都没人阻拦;虽是周六,里面也并未人满为患,不少人都自带笔记本电脑(或者是图书馆的?)默默查询,当然也有占位休憩的,呵呵。据说深圳人均购书率(当然不知道又无包括我这样的外来人口)连续几年超过平均水平,深圳市图书馆又如此开放,恐怕还是与它财政支持大有关系。窃以为,大学图书馆应该列入大学基本建设的第一要务。

**胆小鬼:**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使用了“有条件”和“尽可能”这两个限定词,是为了让各高校根据自身的情况确定是否开放和具体的开放方式,但是绝大多数高校把自己归入“条件不成熟”和“不可能”的行列,这说明高校图书馆完全没有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在我看来,不仅高校图书馆应该开放,高校运动场馆等设施也应该开放,因为中国大学的经费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纳税人,纳税人自然应该享受其中部分服务。当然,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图书折旧率以及对场地的需求也会增加,因此可以适当收费。在服务对象上,还是需要确立本校师生优先的原则,因为他们毕竟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

(本栏内容选自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豆瓣小组](#))

## 来信

**郑鹏:**

第1期提到阿伦特《精神生活》两书,据我所知,它们在翻译方面的诸多问题已经受到很严厉的批评。虽然译者也有解释的文章出现,读来似乎很无力。《精神生活》翻译方面的问题是很典型的,反映了当下繁荣的图书市场浮躁的一个侧面。因为这一期介绍的书译著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当然,这倒不是问题,甚至值得鼓励,所以提醒编委诸仁兄:能不能增开"著作指瑕"之类的栏目,对图书出版、翻译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批评?对翻译问题来说,我一直以为糟糕的译本,实在误认不浅,还不如费些力气去看原著。

很喜欢你们的刊物,第一期就提出自己的看法,实属出于喜爱,请误见怪。

**阅读报告:**

感谢您的来信,的确如您所言,阿伦特的翻译存在很大问题,目前外文著作翻译普遍存在很大问题,也非一日所能矫正,我们推荐外文书籍也只是提供一个阅读地图,至于每个读者具体需要,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朋友对具体的翻译问题进行单独讨论,您的意见也相当好,我们也会考虑您的意见,当然有的问题可能限于我们的精力,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不到之处,还请谅解。

**戴波:**

提个意见,能否以一本书为编辑的单元,而不是以作者。谢谢!

**阅读报告:**

文章的形式将会根据对象量体裁衣,以后遇到尤其重要的著作,我们将以它们为编辑的单元。

**yum zh:**

出版许许多多的书,垃圾的能占上98%或更多。新书就不必每期都介绍了,从垃圾里面挑大个未免也影响你们书评的可看性!如有真的好书,不妨掐一段出来,看书人自能分解个八九不离十!

**阅读报告:**

限于版权,做到这点相对比较困难,还请谅解。

**Chris Li:**

有关一些书名,如果是翻译国外的版本,可不可以将原来的名字也等出来,因为我们这些在国外的读者可以自己在书店里看看原版。谢谢。

**阅读报告:**

我们已经从本期开始,尽力做到这一点。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 [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 季风书讯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 阅读报告独立发行, 欢迎订阅, 谢绝转载。